

# 一生都在探寻药用植物 81岁生命定格在大雪山 活药典 杨竞生

近日,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行杨竞生教授先进事迹媒体通气会。杨竞生是我国著名民族医药专家,云南药检事业的奠基人,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主任药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特聘客座研究员。他是全国中草药、民族药和藏药界有名的“活药典”,终其一生都在探寻药用植物,其不畏艰难、无私奉献、追求科学的精神激励着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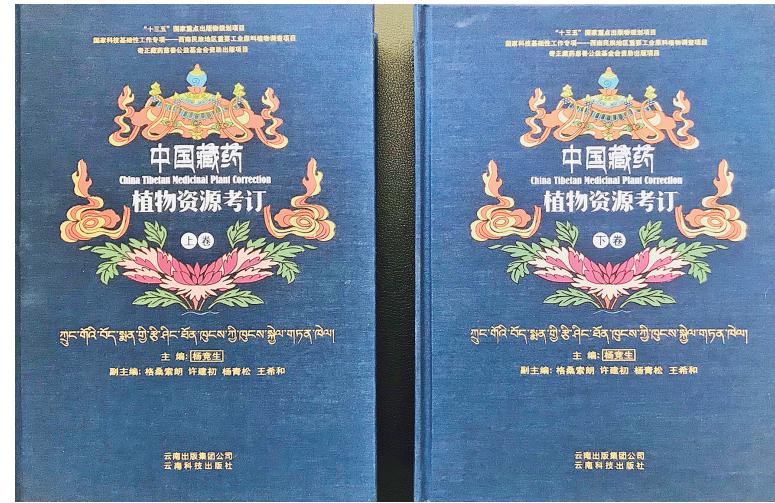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杨竞生(右一)在雪域高原采集标本。



杨竞生(右一)在西藏昌都指导植物腊叶标本制作



杨竞生采集的植物标本



杨竞生主编的《中国藏药植物资源考订》(上下卷)

## 不畏艰险 “老杨采的标本,是一般人所采不到的”

杨竞生1921年出生在广东省阳山县,解放前就读于上海国防医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师从留日药学博士、我国现代第一部《药用植物学》编写者李承祜教授。1950年到云南工作,此后数十年求知若渴,把一生都贡献给了祖国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检验事业,对我国药用植物资源的考证及民族药物的发掘和整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1962年开始,杨竞生不是在野外采集药物的路上,就是在鉴定药物标本的现场。为采到新标本,杨竞生经常风餐露宿,哪里人迹罕至,哪里偏僻险恶,就去哪里采集标本。这种执着探索的精神,从已故著名植物学家、昆明植物研究所原所长吴征镒院士的感慨中得到印证:“老杨采的标本,是一般人所采

不到的。”  
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范兵说,当时云南省药品检验所90%的标本都是杨竞生采集的,西藏药品检验所里有一半以上的标本也是他采集的;北京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所、甘肃省药品检验所、昆明植物研究所等研究和药检机构都有他采集的大量标本。

不仅如此,杨竞生所采标本中还多次发现新种,为表感谢和纪念,药学界把杨竞生采集的一些新种以他的名字命名,如竞生乌头、竞生翠雀花、杨氏紫薇等。  
数十载孜孜不倦地积累,杨竞生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通过对云南特产中药材的深入研究和考证,杨竞生纠正了一些前人的错误。例如,他关于云南地道药材滇

## 一腔热爱 走遍云南的高山峡谷原始森林

杨竞生痴迷民族药并非偶然,他从小就喜欢植物,读书时常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1946年4月及7月,杨竞生先后两次赴贵州平坝高峰山采集标本,所采到的一种紫薇科植物,后来被华南植物研究所(当时广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陈焕镛《中国植物志》两位主编之一命名为“杨氏紫薇”。

来到有丰富药用植物资源的云南工作后,杨竞生犹如鱼儿畅游大海,几乎每年的3月至9月都在野外进行采集考察。在交通欠发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凭着一腔热爱,走遍了云南的各个州市,进高山峡谷、钻原始森林、爬雪山草地。他说:“民族药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该

是原药材的正本清源工作。”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藏药这一祖国医药学遗产,从1962年开始,杨竞生独自一人多次到迪庆州大雪山上风餐露宿,采集藏药腊叶标本;到各藏民诊所了解藏药的使用、效果等方面的资料和实物;访问各个藏医院名家、名医,查阅了大量的中文、藏文与梵文等原著;历时20年,走遍了迪庆的山山水水、雪山草地、原始森林,还包括毗邻的西藏盐井县、芒康县,四川巴塘、理塘、乡城、得荣县,收集了大量藏医常用植物、动物、矿物药材的标本和实物。

2002年,81岁高龄的杨竞生在收集藏药的途中意外失踪,19年来,找寻从未停止。直到2021年6月,杨

鸡血藤不是传统所认为的豆科植物,而是木兰科植物南五味子的考证震惊了学术界。

我国颁布的1963年、1977年、198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中药部分),收载了云南省药品检验所上报的许多药品标准,在标本采集鉴定和资料上报整个过程中,杨竞生一直是主力。

他主编、参修了《中国民族药志》《新华本草》《迪庆藏药》《六省区藏药标准》《中国藏药》等数十种在药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文献,为民族医药的资源保护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他的遗作《中国藏药植物资源考订》,收载植物3100多种、藏药植物彩照1100多幅、约200万字,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全面、最权威的藏药植物资源考订的专著。

竞生百年诞辰之际,在香格里拉大雪山垭口发现了他的遗骸,遗骸上有杨竞生的身份证件和心脏起搏器,遗骸周围还散落着小锄头、口缸、手电筒等物品。遗骸所处位置属于无人区,地形陡峭危险,负责勘探的年轻民警用了3个多小时,才从车辆所能到达的地方步行至遗骸发现点。无法想象一位装着心脏起搏器的高龄老人,在19年前是如何携带着采药工具到达杳无人迹的雪山垭口。

据业内专家介绍,遗骸发现地东旺乡,正是杨竞生首次发现药用植物新种竞生乌头之地。一位穷尽一生探寻药用植物的科学家,81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片雪域圣境。

## 后辈回忆 能跟随杨老学习工作,是一生的幸运

“在植物学界,要发现一个植物新种非常困难,很多工作者终其一生也难以发现一个。”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的主任医师明全忠是杨竞生的后辈学生,回忆往昔,明全忠讲述了许多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1979年,我刚到药检所,分配到云南省药品标准办公室,跟随杨老师等前辈从事民族药研究工作。杨老师经常晚上在办公室工作至深夜,他十分关心我这个新兵的成长,常给予我指导指点,如从事民族医

药研究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和技能,如何查阅文献等。

40年前,我作为助手随刚重伤恢复的杨老师到怒江、德宏、临沧、大理进行怒族、傈僳族、佤族、傣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白族药调查。我们一路乘公交车前往,在怒江时遇到塌方,公交车停运,我随杨老师一天徒步30公里。我们还背着录音机、标本夹、几本高等植物图鉴。我们边走边采标本,有时还要进行采访,并录下采访内容。

制作植物标本是解决植物学教

具问题的有力手段之一。那时出差,我和杨老师每天晚上都要换标本纸,将换下来的纸烤干或晒干后次日再用,这个工作在农村做起来比较方便,遇到下雨或在州县,难度就很大,要找食堂锅灶处烘烤。杨老师每次都和我一起完成此项工作。

与同辈人相比,在学术渊博的前辈身边学习工作,并能得到指导指点,是我一生的幸运。

本报记者 孙江芸 文  
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供图